

# 何谓中国：既知主义之可贵，又知民族之可爱

王锐

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就历史知识而言，需要人们一方面更为全面、细致地了解近代以来的世界局势演变，做到名副其实的“开眼看世界”；另一方面需要返视自身的历史，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建立起自洽的、完整的、接地气的中国论述，使之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知识框架与价值准则。同时洞察那些打着学术名义大行其道的旨在解构中华文明延续性与整体性的历史叙事。



颐和园门口的龙雕

图片：视觉中国

## 《何谓中国》：为整体把握中国树立良好而自洽的尺度

姜义华教授的新书《何谓中国》就是一本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审视中国自身文明史的著作。作者从先秦时期“中国”观念的形成及其政治实践、多元一体的中国、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转型等方面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如何促成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如何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日常政治运作，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中国核心特征与历史流变，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中国的重生。在这样扎实的学理梳理中，由古代至当代的“何谓中国”的答案清晰浮现。

以往描述中国的著作不同之处在于，你可以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认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核心根脉与历史传承，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树立一个良好而自洽的尺度。

## 廓清误读，去除西方化视角，依据语境挖掘抉择逻辑

本书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脉络出发，分析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历史流变，澄清了许多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影响而出现的中国论述所造成的认知误区。比如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不能简单地以“专制”视之，而是应该具体分析它是如何运作的，不同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什么，稳定的政治组织对于经济生产的进行有何重要意义。

又比如书中详细分析了在近代国势衰微之际，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思考建立能令中国实现振衰起微的政治制度。在这其中，有人坚持要在承认中国古代政治遗产的基础上思考开新之路；有人则将其所理解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希望在中国推行之，全然不顾如此这会对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社会稳定造成怎样的影响，更忽视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必

须充分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险峻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从这里，可以为今天人们思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提供借鉴。

谈及中华文明及其现代转型，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明之间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说清楚。本书同样将此作为分析重点。作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重塑，即通过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农村面貌的改变是让中国得到新生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许多政治与经济实践中，真正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使中国传统以崭新的面貌再次焕发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传统，不能无视或者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如何更好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乎未来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之成败。

## 中国论述方法论：注重社会经济基础，注重各朝代制度贡献

本书的研究方法亦值得重视。一般而言，宏观地谈论中华文明或中国历史的整体脉络，很容易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之中，即“去历史”地抽取某些概念，将这些概念的某种意涵等同于中国历史变迁之中的基本特征，既无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又忽视了这些概

念之所以能够出现并流传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如此，在论述中华文明时，极易呈现一种玄学化的特征，最终变成自说自话。

姜义华在论述中华文明的发展流变时，非常注意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角度去思考中国的疆域何以不断扩大，郡县制国家何以长期存在。他提醒人们，思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不能忽视其经济基础，这既是中国历史的厚重遗产，又是今天思考中国现代化建设时的基本起点。

与之相似，姜义华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延续性与整体性，与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息息相关。要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根脉，离不开对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国家的制度创建精神、制度运作逻辑与制度修复能力进行细致的剖析。

## 兼顾内外视角：既“知主义之可贵”，又“知民族之可爱”

姜义华用了不少篇幅来分析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境遇。他强调，要全面理解何谓中国、理解中国历史的完整图景，就不能忽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挑战，以及为了振衰起微而进行的艰辛探索。那种率由旧章式的文化想象既不能真正把握何谓中国的关键要素，也不能形成具有时代感与生命力的历史论述。从历史过程来看，近代中国不但需要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维护版图

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而且要通过内部的变革，形塑新的政治主体，让那些在古代的社会形态里属于失语状态的群体成为新的政治与文化形态的主要实践者。

要做到这两点，套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既要“知主义之可贵”，又要“知民族之可爱”。就此而言，既要从中国的历史流变出发认识何谓中国，又要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变局与危局有清晰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何谓中国绝非仅限于中国内部，对外部有越来越全面的、冷静、客观的认识（而非把对外部的迷恋等同于对外部的认识），就更能更为饱满且自信地认识何谓中国。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区别地运用市场，也恰恰得益于此。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进步。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本书的主题之一，在中国的经验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阿马蒂亚·森为中文版所作序

在我最近10年阅读的所有经济学著作中，让我爱不释手、常读常新的就一本书，即译自英文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讨论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书，博大精深，堪称经典。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关于社会选择、公共福利和社会正义的理论，涉及社会福祉、收入分配、个人权利和公众的选择方式等重要话题。很显然，在最基础的理论层面，经济学的讨论会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话语碰撞起来。

## 诺奖授奖公告用26页概括其贡献

该书作者阿马蒂亚·森1933年生于印度，至今仍保留印度国籍，但长期在英美最高学府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199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年他刚从哈佛大学退休。获奖后他被哈佛大学聘任著名的三一学院院长，那是他求学的地方。过去10年，他多次来中国讲学或出席论坛，也为中国经济学家以外的知识界所熟知。

我认为，在经济学的最基础领域，当代有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教授（2017年去世），另一位就是阿马蒂亚·森。他是在更多领域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发展问题和经济学基础领域贡献巨大，而且深刻影响着公共话语领域和公共政策。当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用26页来概括他的贡献，足以显示他的学术成就。

## 论证了发展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更高层次的价值范畴

阿马蒂亚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发展观，要么把发展看成是GD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升，要么把它等同于工业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现代化。这些无疑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阿马蒂亚认为，这实际上还只是把发展视为工具或手段，尚属工具性范畴。发展的真正目的理应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价值范畴。

阿马蒂亚在书中严格论证的一个命题是：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目的是拓展人们的自由与选择范围。这里所说的自由，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指人们能过上有价值生活的能力，用阿马蒂亚的原话，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在此意义上，消除那些妨碍人们享有选择或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作为人的主体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就构成了发展的基本要义。

具体而言，实质性的自由包括人们有可行的能力免受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苦难折磨，有权在遭遇失业时得到救助，收入在低于某个最低水准之下时有资格得到补贴，每个孩子都有权利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等。阿马蒂亚从理论上论证，为人们获得或扩展可行能力才是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 找到了各派学说关于价值背后统一的“信息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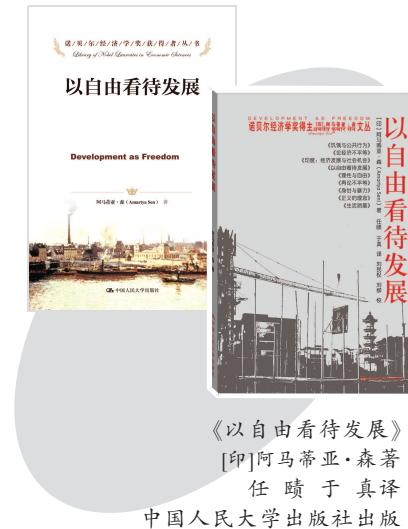
阿马蒂亚选择从自由层面来看待和发展发展的目的，堪称创新之举。一旦从自由或可行能力视角看待发展，一下子就把发展问题提升到了哲学层面，成为高于其它工具价值的最高价值标准。在这个更高的层面，经济学就有机会超越对效率的分析，与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怀统一起来。所以，他的这一工作非常重要，找到了一个可将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统一的更宽广的理论框架，不仅有效拓展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与视野，而且足以让我们清晰看到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在社会公正话语上讨论的局限。更重要的是，阿马蒂亚找到了各派学说关于价值标准背后统一的“信息基础”。

举例来说，就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而言，经济学的传统所依赖的功利主义价值标准，简单说就是追求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但这个价值理论忽视了分配上的可能后果。在总的产出水平（如GDP）不变前提下，难道我们有理由不关心一个相对均等分享成果的状态与一个成果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状态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两者的差异？所以，功利主义理论提出的价值标准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所依赖的信息基础过于狭窄，无法顾及到全部价值层面。阿马蒂亚认为，这就需要拓展它包含的信息范围以容纳对发展后果的更多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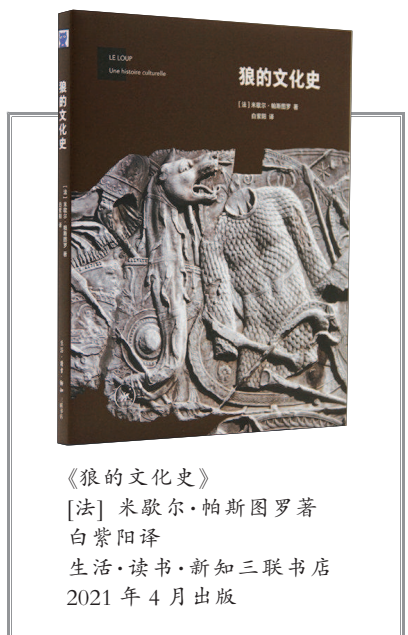
在阿马蒂亚看来，除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观也有同样的问题。它过度关注人们的选择过程和行动的

# 阿马蒂亚：以人为本是一种最高的价值标准

张军



《以自由看待发展》 [印]阿马蒂亚·森著 任贻于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狼的文化史》 [法]米歇尔·帕斯图罗著 白紫阳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4月出版

法国学者米歇尔·帕斯图罗的名作《狼的文化史》中译本面世，在常人看来，或许只是在眼下中国图书市场的“文化热潮”中激起了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文化史”：婚丧嫁娶、饮食起居、博物考古、街头巷尾……一切均可以“文化”为名，也均可成为历史书写的主题，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的路径变得更加“多元”或“丰富”，毋宁说，其中蕴藏着让严肃议题消解为猎奇谈资的风险。然而，若是带着这样的担忧来阅读《狼的文化史》，却发现，书中用神话寓言、图像艺术和文学想象等素材串联勾勒而成的“狼”的文化意象，实际上会让我们直面一个萦绕欧洲文明数千年的重大历史问题——如何对待人类本性中固有的“野性”？

## 狼在“文化”中被驯化成节制而忠诚的狗？

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是：

# 狼如果穿上衣冠……

冯庆

用文化来化解野蛮。诚然，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划出界限，确立制度、法律、礼仪和文化，这样的行动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区别于其他动物之本质属性的实现。这一“文明化”的历程，也是人类作为动物的某些自然属性——如贪欲、残暴和愤怒——遭到压抑与改造的历程。对于成熟的欧洲文明来说，这一体验尤为显著。《狼的文化史》借助词源学和民俗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古希腊、凯尔特和高卢，象征着文艺、礼仪和知识的太阳神的神格里，往往蕴藏着与“贪婪、狡诈、盗窃成性”的狼有关的形式或内涵（页13-23）。这就好像“太阳神”最终征服了“狼”，并让其隐遁在文明的光泽之下。这一细节让我们窥见了全书的核心线索：人类的自然野性，在“文化”的历程中不断被驯化，就像贪婪且不羁的狼最终被驯化成节制而忠诚的狗那样。讲述一个“狼”逐渐穿上华美衣冠的童话寓言，将有助于让人对文化启蒙充满信心。

可是，漫长的欧洲文化史又告诉我们，“狼”的幽灵并未随着文明的进步而被祛除。这或许是因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狼”的本性又必不可少。罗马国父罗慕路斯曾受母狼哺育，这或多或少指涉着其以杀伐立国的恐怖真相。帕斯图罗则告诉我们，随着国家的成长，这种象征原始暴力的育婴母狼崇拜逐渐被代表丰收的农牧崇拜所吸纳，净化（页31），这无异于说，罗马人——及其欧洲的后嗣——已经学会了用优美和崇高隐藏这种真相。这样一来，“野蛮/文明”的二元关系，事实上也就并非历史中的先后关系，而是艺术中的表里关

## 狼的本性可以通过文明来改变，这是误解

这一梦魇，就是霍布斯曾经援引拉丁名言“人于人是狼”（homo hominis lupus）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在其中，每一个个体都视他人为生死之敌，由于害怕自己已被他人消灭，而猜忌仇恨他人。因此，霍布斯以降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不得不思考：这一巨大的“自然状态”凶兽该如何才能穿上文明的衣冠呢？政治哲学家阿甘本援引中世纪文

学名作《狼人》指出，故事中那个和国王关系亲密、能够通过脱下人类外衣而变成狼的贵族，实际上正是“例外状态”下遭到宰制的“赤裸生命”，这也揭示了欧洲的“野蛮/文明”语法当中蕴藏的政治治理术奥秘：“狼”的形象一旦落在个别的人物、群体和阶层之上，也就意味着他或他们将被开除出西方文明的序列，返回到弱肉强食的“自然”当中，直面暴力和灾厄。

作为阿甘本的同代人，帕斯图罗同样提及并分析了《狼人》这一作品，不过，他的重点在于解释狼人传说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并让我们相信，“狼”就应该是凶暴可怕的，是不安定的“魔鬼”因素。与此相应地，帕斯图罗在全书的开端和结尾均对当下诸多“洗白”狼之形象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嗤之以鼻。

通过文化史书写，他清晰地说明了来自荒野的“狼”何以必须被文明社会排除或掩盖起来。不假思索地把穿上可爱衣冠的卡通狼作为真正的狼的代言人，认为它的确无害于人，这既是对现实动物本性的误解，也是对人类古已有之的狼性本质的轻视。同时，帕斯图罗对文化之“衣冠”意涵的若有若无的强调给出了回应：既然狼总是伴随着普照万物的太阳神出场，那么人类——尤其是西方人——就不能认为作为自然本性的暴力可以随着文明进步而彻底终结，或只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例外状态”的产物。

狼的文化史，也正是人的文化史。（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